# 学习文选

（评《水浒》专辑）

2

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编

一九七五年十月

#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

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

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1）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12）

投降派宋江的丑恶言行

——《水浒》故事摘评

……上海市总工会工人评论《水浒》学习班（22）

#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 一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

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搅河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割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

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返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

“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谶纬谎言，把

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

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和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

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投降有理，真是反动已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是他要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所谓的“忠义”，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是“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和起义农民长期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是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家“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

他们的反抗精神，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起义军引向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要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 四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的投降主义总倾向是通过歌颂投降派宋江来表现的。因此，揭露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对于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极为重要。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串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一部《水浒》，对宋江竭尽美化之能事：无耻的叛徒被颂扬为梁山的“恩主”；皇帝的奴才被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写成了上符“天意”、下合“人心”的正确路线；受招安的丑剧被夸耀为梁

山革命根据地的盛大节日。《水浒》通篇到底，对宋江及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全是歌颂，没有批判。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象《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的歌颂；象《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意投降的吴用自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三阮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还是在成书以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三十六人内都有晁盖。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列宋江于一百〇八人之首，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胡适从一九二〇年起写了几篇关于《水浒》的文章。他站在帝国主义奴才的立场上，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论的实用主义方法，歌颂宋江是“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在当前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必要结合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肃清其流毒。

《水浒》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